

一、稻作農業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一)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波濤壯闊，不僅在時間及空間上都顯得淵源有自，德澤深厚，而且中國文化的組成因素也種類繁多，其中以稻米為中心的農業生活方式實在是一個極端重要的部份。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在中國這一塊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生死以之，他們的血汗注入中國的土壤，得到了豐碩的收成。這種以農為本的生活傳統，使中國人深深地植根於與他們所生長的土地之上，中國的社會也因此具有強烈的鄉土性格；由於稻米生產的要求，而凝塑了中國文化中重視灌溉以及講求品種改良的傳統，也形成了傳統中國經濟生活中重要的面貌；在這種社會及經濟背景之下，傳統中國的政治也具有強烈的重農抑商的取向，而傳統思想中企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希望在自然秩序與人間秩序之間獲得一個動態的平衡，這種思路與悠久的農業傳統是有密切關係的。因此，以稻米為中心的農業生活方式在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思想活動中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這一個意義上說，傳統中國文化可以說就是一個「稻米的文化」。

稻作農業起源於何時？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稻米生產？這是我們探討稻作農業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時，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





「耕織圖」所見的中國傳統農業與農村

根據稻作學家張德慈教授的研究，稻作栽培起始於狩獵、捕魚和採食為主的居民偶然撒落種子在低窪土地並改造成耕種的環境。整地、插秧、和灌溉主要發展於中國黃河流域及漢水盆地。由於稻作之栽培係自天然淹水區擴展至深水或乾田之邊緣地區，人為與自然的選擇加速了諸如浮稻和陸稻等特殊型態水稻之發展。在一地理區域範圍內由人為的栽培推廣與繼續的選擇可產生出足以識別的稻型或種族，但是在一個地區內主要品種迅速地發生變遷是由於人與人間廣泛的接觸。這種交流也可以導引人口的增加，食用習慣的改變，並使特殊合適於水田拉曳之畜力與有關農機具的大規模採用。當水稻品種消失它們原始的特性而獲得廣大的適應性時，則不稳定性之障礙得以形成，以及部份重複同基因子消失了。一種生長儉約且高產的株型便在溫帶形成。中國史前稻穀的遺跡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河南澠池仰韶村、安徽肥東大陳墩、江蘇南京廟山、無錫仙蠡墩、浙江吳興錢山漾、杭州水田畈、湖北京山屈家嶺、朱家嘴、天門石家河、武昌放鷹臺等處均會發現。考古學家證實，至遲在公元前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中國就已開始種稻了。最近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就發現了我國也是全世界最早水稻栽培紀錄。

從仰韶時代以後，稻作在中國的農業系統中就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從甲骨卜辭中所見，殷代主要的農產品有黍、檉、麥、桃四種。其中檉就是稻，桃就是小米。最近更有學者認為，卜辭所見的「柅」字就是多年生的野生稻 (*Oryza pennis*)。到了西周時代，稻的食用可能更加普及，西周銅器銘文上常常看到「用盛稻梁」的文句，就可以證明稻梁已是貴族宴食上常見的食物了。到了春秋時代，稻已是一般生活中的食用物品了。自春秋以後，隨著南方中國的開發，稻米在中國文化中的比重愈顯重要。尤其是從漢代精耕細作的農業系統建立以後，更是如此。

(二)

從經濟面來說，稻作農業的傳統也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打上了烙印，其中最為明顯的則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經濟生活方式。古代中國的《詩經》〈豳風〉「七月」這首詩中就有「十月穫稻，爲此春酒」的記載。我們可以遙想先民在長江中下游的大平原區辛苦耕耘，在秋天收成的季節裏，手捧豐碩的成果，那種手足舞之蹈之的欣慰之情。根據古代典籍如《周禮》「職方氏」的記載，古代中國適合於栽培稻米的地區有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幽州等地，也就是今天的長江中下游及華北一帶，可以說適合生產稻米的地區分佈很廣闊。由此可以看出稻作農業在古代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稻作農業使古代中國人的生活隨著春夏秋冬的嬗變而循環。秋天收成之後，慶祝之餘，用稻及黍來釀酒，以備冬天及春寒時節飲用。在古代的文獻記載上看，殷商時代的中國人似乎是很嗜酒的，所以在公元前第十二世紀周人征服商人，建立周朝之後，開國元勳周公就一再地告誡周的臣氏不可因酒誤事，必須隨時莊敬戒慎地努力以保天命。

除了經濟生活的循環性之外，稻作農業也決定了傳統中國經濟生活的許多重要的方面，例如：對於灌溉事業的重視、對農業的講求等等可以說都直接與農業有關，先就灌溉事業來說，研究中國農業史的許倬雲教授在《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這部書中就指出，從戰國時代開始，由於鐵製農具開始加入生產的行列以及牛耕技術的普及農田，所以農業的生產大為增加，可以養活與日俱增的人口。和這項發展相伴而行的則是灌溉方法的飛躍進步。在春秋時代以前，灌溉方式大都是以瓶裝水，事倍而功半，緩不濟事。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槓桿原理的運用以及桔槔的發明都使灌溉工程有了很大的進步，而成爲

「天工開物」所見的傳統農業



中國稻作農業發展進步的一大動力。通貫整個帝制時代的中國歷史，灌溉事業始終是一項重大的政府工作，尤其是地方政府及鄉紳出力極多。維特孚哥（Karl Wittfogel）曾因為這一事實而撰寫專書說中國是一個「水利社會」，大規模稻作農業需要集體勞動的灌溉事業，他認為這是中國專制政治的根本基礎。這種說法只見問題的一面，立論偏頗，早已為各方學者所駁斥，已不能成立。但是，我們翻閱二十四史歷代史書中的「溝洫志」仍可以覺察到灌溉事業在整個中國經濟生活中所佔的份量，這與稻作農業是有深刻的關係的。

再就農學的講求來看。中國稻作農業起源很早，而講求稻作農業相關學問的書籍至遲在戰國時代就出現。最著名的就是《呂氏春秋》這部書中的「任地」、「墾土」、「審時」這幾篇以及《管子》書中的「地員篇」，講求農作物的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土壤性質及農作時節等農學問題。我們只要稍稍留意一下中國傳統農書，就可以知道中國農學傳統的悠久博大，其中專談稻作農業技術的則有明代黃省曾所寫的《稻品》（亦稱《理生玉鏡稻品》）這部書專門研究稻的品種，可以視為稻作農學傳統中有關品種改良知識的總匯。由此也可以反映出稻作農業在傳統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II)

我們再從社會面來看。傳統中國社會有許多特質是深深根植於稻作農業這個傳統之上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分成下面幾個角度來觀察：

首先，我們可以說幾千年來的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建立在親緣關係基礎上的禮俗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大家庭（也就是社會學家所謂的 Extended family）是主要的單位。為什麼中國社會有這種特質呢？它的原因從稻作農業這個角度來看就比較容易瞭解了，在傳統中國以

稻作為中心的農業生活中，農業生產是以家庭農業為基本單位的。家不僅是個人人際關係開展的據點，也是生活消費所依賴的基礎。而稻作農業從育苗、插秧、除草、除蟲、收割到貯藏，這一系列的過程中，需要龐大的勞動力，這種經濟生活上的實際需要是形成中國大家庭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家庭裏，每多一個人，在農業生產上的意義就是多添了一個勞動力，所以「多子多孫」便是幸福與財富的淵源。所謂「五世其昌」，代表了子孫繁衍綿延不絕的意義，也代表了農業勞動力充沛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在傳統中國歷史上，社會與經濟因素是整合為一的。

其次，傳統中國社會的另一項重大特徵是除了重大的天災人禍而必須移民謀食之外，人口流動性極低，是一個典型的靜態社會。一個社會學家會形容中國傳統社會的居民是「深植於泥土的」（*earthbound*），就傳統社會中安土重遷的特徵而言，確為相當的描寫。何以會有這樣特質？原因當然是很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因則與稻作農業有密切關係。稻作農業必須固定在土地上，不可遷徙。因此，土地財的重要性遠超過任何其他資源。因為「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大學》），土地是生活資本的來源，所以傳統社會中的居民深深地認同於土地，他們是一羣半身植根在泥土中的樸實農民，無視於歷史上一切的動亂或風暴，篤定地向大自然、向土地討生活。正因為他們是這樣深植於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所以他們把離鄉背井流寓異域視為人生最大的悲哀。

（四）

從政治面來看，中國的政治傳統至少有以下兩項取向與稻作農業的生活方式有密切關係。第一是傳統政治中重農抑商的政策取向。由於農業是一種生物性的生產方式，其生產量

永遠無法與工商業相比擬，所以從戰國時代開始，農民的處境一日比一日困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綉紋不如倚市門。」這是歷代歷史家所發出的共同的喟嘆。在這種經濟背景之下，從漢代開始政府常常在政策上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每年春天農作物播種的季節裏，皇帝常常象徵性地下田耕作，以示對農業的重視。對囤積居奇致富的商人則常採取若干抑制措施，如商人不得「衣絲乘車」，商人之子不得應官方考試之類。這些措施在工商勢力日益壯大的潮流下雖不一定能產生實際的效果，但至少反映出傳統的政治與農業的深刻關係。

第二、是仁道政治永遠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項理想，這種理想與農業的生活方式也互有關聯。春天是萬物生長茁壯的季節，政治措施上也深以刑戮為戒。罪犯的處決必待秋季來臨，農作物收成，大地一片肅殺之氣的時候，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這一條深植於農業社會的信念也成為歷史上歷代儒臣引來馴化專制政治的根據。這一種仁道主義常常呈現在具有民胞物與胸襟的政論家奏摺或詩人的詩篇之中。例如唐代的詩人杜甫關切平民的生活，他的詩作如「解憂」詩：「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鬪穀行」詩：「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以及「兵車行」詩：「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等都是以稻作農業為背景對當時政治提出沉痛抗議。唐代另一位著名詩人張籍的「屯田詞」詩篇中所寫的「春來耕田遍沙磧，老稚欣欣種禾麥」這種欣欣向榮的農村生活正是歷代政治家所夢寐以求的境界。

(五)

最後，我們談到中國的思想傳統與稻作農業的關係。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天人合一的

思想是一條重要的主流，傳統中的思想家多企求在宇宙自然大化流行的秩序與人間活動的秩序之間保持一個平衡與互動，並進而獲致一種動態的和諧的境界。這種思想淵源很早，孕育於西周初年人文精神初露曙光的時代裏，而大放光芒於秦漢大一統帝國建立以後。漢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以及《春秋繁露》書中所提出的「天人相應」「五德」「金、木、水、火、土」終始的思想系統，最足以視為這種思路的代表。歷代思想家不論是講求道德氣象的儒家，或追求藝術精神的道家，他們都企盼人類的活動與自然的秩序和諧無間的境界。哲學思想上天人合一的理念表現在傳統山水畫中，就是逸人負杖逍遙徜徉於自然山水的美景之中。「制天而畜之」的思想非常少見。何以中國的傳統思想中有這種特質呢？

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方向固然很多，但是以稻作為中心的農業背景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在農業社會中，人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與自然相終始，大自然提供人類生活的資源，是人類的保母，人類徜徉於其中只感覺到溫馨、和平，人不會像近代的「浮士德」(Faust)一樣地要去征服自然。農業作物生長所需的雨露由上天賜予，所謂「春雨貴如油」的諺語最能體現出人對自然的孺慕感激之情。

稻作農業是傳統中國文化主要命脈之所寄，也是近代中國各種農作物生產的最大宗。根據美國學者卜凱（John Lossing Buck）在《中國的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書中的統計，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三三年為止，中國的各種作物中仍以稻米所佔比例最高，恆佔百分之四十左右。就臺灣農業的狀況來觀察，稻米也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日據時代更有所謂「米糖相尅」的現象。稻米與蔗糖是臺灣農業生產的大宗，因此兩者間有爭奪農地的經濟現象。

現代台灣農業





現代台灣農業



今天臺灣農業因為經濟作物的發達而消戢了這種現象。最近，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的技正陳武雄先生曾對臺灣地區稻米的需要及消費作分析研究，他由一項稻米食用方程式中，計算出稻米需要所得彈性為負〇・二一五九，當每人所得提高1%時，稻米食用需要量將降低為〇・二二%。如果每人所得照十年經建每年成長五・七%計算，則十年間稻米食用需要量將減少十三・三%。顯而易見的，在臺灣經濟發展不斷成長，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的狀況下，稻米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將隨之降低。但是，中華民族畢竟是一個以米麥為主食的民族。稻作農業在歷史上塑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面貌，今後也仍將在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一九八二、六、七）

